

治霾也要有经济“药方”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征资源税极有必要



文/本报特派记者 孟敏 李钢
片/本报特派记者 王媛
3月3日发自北京

3月3日,北京再现雾霾天,如何治霾成了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考虑到我国目前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机制性的资源粗放低效耗用,可以经济手段化解雾霾等环境威胁。

贾康介绍,雾霾的第一大成因即,我国近95%的人口聚居于仅占42%左右国土的“暖湿一腾冲线”东南方,使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压力呈现“半壁压强型”,而且我国基础能源主要靠煤炭,目前全国电力供应中约80%是烧煤发出的火电,煤的清洁化使用难度高,对大气污染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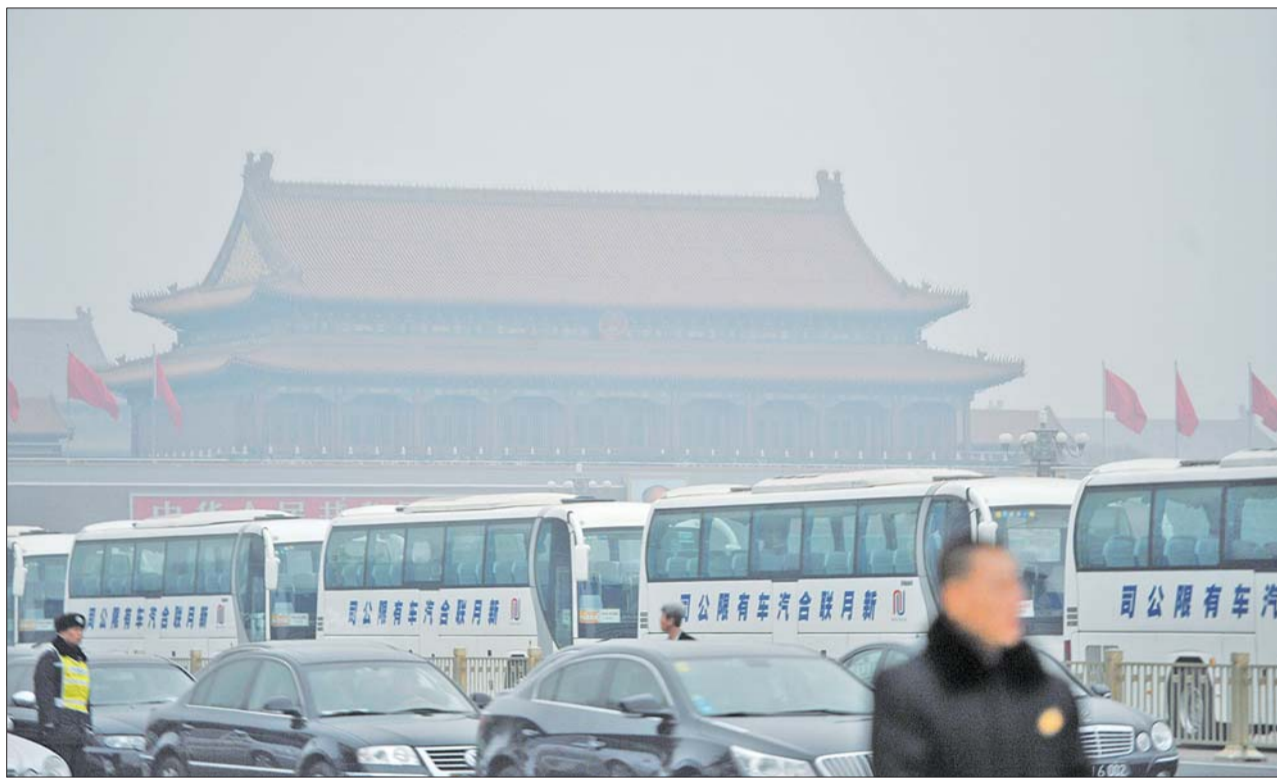
作为财税专家,贾康提出“以经济手段为主化解雾霾等环境威胁”。他分析说,“从煤到电”的产业链上,严重的比价关系与价格形成机制扭曲、非市场化状态一直存在,形成“无处不打点”的分配紊乱局面,助长着粗放式、挥霍式的增长状态和消费习惯。

“社会中的主体几乎谁也不真正把节电、节水当回事。”贾康直言,节电节水,在我国实际上就是节煤降污,就是减少雾霾。

在贾康看来,下一阶段极有必要推进从资源税改革切入,逼迫电力价格和电力部门系统化改革,进而引发地方税体系和分税制制度建设,以助益市场经济新境界的新一轮价税联动改革。

贾康说,新一轮价税联动配套改革的一大关键,是抓住我国煤炭市场价格走低的宝贵时间窗口,推出将资源税“从量”变“从价”机制覆盖到煤炭行业的改革。

新一轮价税联动配套改革,将使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顺应市场经济。“这会促使现已达6000万个以上的市场主体和近14亿居民,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根据市场信号主动节能降耗。”贾康说,企业会千方百计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家庭和个人也会注重低碳化生活。



▲3日,北京雾霾,天安门广场能见度很低。

河北三河市的治霾样本

拆掉水泥厂,粉尘少了三千吨

河北廊坊距北京只有20多分钟的高铁路程,空气综合污染指数排名居高不下,让这座城市倍感压力。为改善大气质量,从今年1月开始,河北廊坊在境内开展了集中拆除水泥、矿粉等高污染企业的“风暴行动”。

本报特派记者 宋磊
3月3日发自廊坊三河市

3月3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廊坊三河市区以西10公里左右的岩峰新型建材公司,原本林立的水泥生产设施几天前已经被全部拆除,空旷的厂房大院里只剩下一堆堆的建筑垃圾和拆卸下来的设备,几辆铲车和碎石机正在忙着清运。

公司看门的刘师傅向记者描述了这座水泥厂昔日的辉煌:“岩峰是三河的老水泥厂,2001年建厂,共有两条生产线,有工人上百人,年生产能力可达到50万吨左右。”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几天前的爆破声烟消云散。

三河市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县级市之一。“我们相当于

北京的东大门,空气污染治理难度大,我们的压力更大。”三河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赵海亮表示。

三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鲍爱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去年11月起,供电局就对全市所有的23家水泥企业断电停产,今年4月底前,全部完成拆除工作。”

这23家水泥企业涉及产能1554万吨,赵海亮表示,全部拆除后,预计将控制粉尘达3000吨。

为了让拆除工作顺利推进,三河市将拿出8亿元左右的以奖代补资金,对拆除的水泥、矿粉等企业进行补偿,其中包括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赵海亮以水泥行业为例说,淘汰每万吨产能补贴30万元左右。

水泥企业拆除后怎么办?刘师傅说,“老板还有房地产、建筑等其他产业,工人都被安排到其他厂子干活去了。”

鲍爱东介绍,今后三河市将引导被拆除的水泥厂,对原有设备进行技术改造,达到绿色生产标准。“我们还将着力引进北京等地无污染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吸引更多外来企业落地三河。”

不过,拆除仍然遇到了程序上的问题。三河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坦言,目前拆除的都是手续齐全的水泥企业,在治理雾霾过程中,没有合理的政策性文件要求水泥行业退出市场,只能对各水泥企业进行耐心劝导,希望他们积极配合拆除。

头条链接

淄博首创 刑责治污

本报特派记者 王富晓
3月3日发自北京

“把市委政法委加进来,由他们制定打击环境犯罪文件,这在全国是最早这样做的。”3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淄博市市长徐景颜告诉记者,今年年初,淄博市政法委出台《全市政法机关全力支持环保工作的10条意见》,从重从快、顶格处理,治理环境污染,加强了部门之间的联动,形成全市政法部门“围剿”污染的合力,拉开了刑责治污的序幕。

这10条意见分别是:营造依法保护环境的浓厚舆论氛围,组织开展“铁拳治霾”专项行动,严查高污染排放车辆,快侦快破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案件,从重从快提起对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案件诉讼,深入查办和预防环境污染犯罪背后的职务犯罪,深入开展对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诉讼监督、依法顶格审理重点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加大强制执行力度,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深入查办和预防环境污染犯罪背后的职务犯罪”和“依法顶格审理重点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作为我省传统的重化工城市,淄博的环境问题关系着城市未来的发展。徐景颜告诉记者,过去的环保执法,由于只是单纯的行政执法,力度并不够,执行起来困难重重。而环保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环保和司法部门的紧密配合,这样才能有合力。

根据“10条意见”的要求,凡达到法律认定标准的环境污染案件,公安机关要“快侦快破”,检察院要“从重从快提起公诉”,法院要“快立、快审、快执、快结”。

“从出台这10条意见至今,由于时间尚短,还没有一例达到入刑的标准。我个人认为,刑责治污的做法,震慑力度更大。”徐景颜认为,尽管这一做法尚需要时间去检验,“不过,从目前来看效果还是挺好的。”

限购限号限行,代表委员热议各种“限象”

一味“限”是懒政,不包治百病

道路拥堵不堪、住房供不应求、公共交通不堪重负——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各种烦恼随之而来。怎么办?于是,限行、限号、限购、限贷、限流……“限字诀”在各地轮番出台。然而,问题解决了么?“限象”,成为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交通运行报告显示,2013年北京全路网工作日平均每天堵车1小时55分钟,比上年每天多堵25分钟。这意味着,3年的限行不仅没改善拥堵,形势还进一步严峻。

在中心城市、省会城市,拥堵已具普遍性。继北京限行后,广州、天津、成都等地也出台类似政策,以期缓解拥堵,但均未因此改善。

“以摇号限购等方式控制机动车总规模上升,不过是推迟交通系统‘堵死’状态到来的时点。”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

除了限行,还有限购。同样,不少城市房价并未得到

抑制,相比3年前各地集中出台限购时,已几近翻倍。

由于“限”带有极强制行政干预色彩,因而其出台也引发了是否公平的讨论。

一直参与北京小客车指标摇号的温先生就提出了质疑。“对于总摇不到号的人来说,无法获得驾驶证,其实是不公平的。”温先生说。

“即使有些限令的效果是好的,但毕竟是一种行政干预,行政干预不能代替市场规律。”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说。

代表委员认为,面临特殊阶段的发展难题,政府在发挥管理作用的同时,要避免患上“限令依赖症”。一味

依赖“限”,其实是一种懒政思维。“这其实是一种隐性的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而一些城市的管理思路还从念“限字诀”向“费字诀”演变。去年秋天,关于“北京、上海正在研究征收拥堵费”的消息,引起了普遍关注。

“对市场主体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部门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设限、收费这样的城市管理方式,显然与当前我国简政放权、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相距甚远。”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说。

据新华社